

【埃及】伯哈·塔赫尔 著

# 爱在流放地

向培科 译





## 作者简介

伯哈·塔赫尔，埃及著名作家，生于上埃及，毕业于开罗大学历史系。1958年参与创办埃及广播电台第二套文化频道节目，并从事戏剧评论。20世纪70年代中叶，被迫出走埃及，先后去罗马、新德里、巴黎、内罗毕等地为多个国际组织进行翻译工作。1981年转入联合国驻日内瓦总部工作，于1995年返回埃及。

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1972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求婚》。1974年、1979年先后出版第二、三部短篇小说集《今天我梦见你》、《我是国王，我来了》；1983年、1985年先后发表长篇小说《椰枣林的东方》和《她上午说话了》。

《爱在流放地》是他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1995年出版后，获当年开罗图书博览会最佳长篇小说奖，被誉为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典范。

塔赫尔于1998年获埃及最高文学奖——国家文学鼓励奖。他的作品结构严谨、语言清新，有神话般的想象，渗透着埃及和阿拉伯的社会风情。

## 主要人物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开罗某报社常驻欧洲某城市的记者。

麦娜——“我”的妻子，后离婚。

哈里德、哈纳蒂——“我”和麦娜的儿子和女儿。儿子在上大学，女儿在上初中。

阿卜杜勒·纳赛尔——埃及“7·23”革命领导人，埃及前总统。

萨达特——纳赛尔总统的继承人，埃及前总统。

阿连德——智利前总统，1971年军人政变后被杀害。

穆勒尔——医生，当地“国际医生人权委员会”的发起人。

伯蕾吉蒂·希弗尔——本书女主角。“我”的情人，导游小姐。

彼德罗·伊巴尼兹——智利政变后的受害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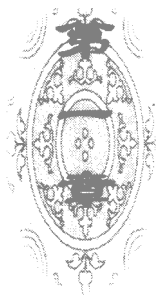
伊卜拉欣·艾勒·麦哈拉维——记者，“我”的旧友，后在贝鲁特某个抵抗运动组织机关报社工作。

夏蒂娅——伊卜拉欣之妻，后离婚。

伯尔纳——记者，当地《前进报》主编。

尤素福——从埃及逃亡出来的大学生，后在当地一家咖啡店打工，与咖啡店老板娘结婚。

哈密德埃米尔——海湾某国国王的儿子，在欧洲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



## 记者会上邂逅

我爱上了她，无可奈何地爱上了她，迷上了她……

她年轻、漂亮，而我已是一个老头，孩子的父亲，离了婚的人。原本，我脑子里没有爱的念头，也没有任何试图表达对她的痴迷的举动。

她后来对我说：你的双眼流露了那份爱。

我是开罗市人，被迫离家出走，到了陌生的北方。在这个地方，她跟我一样，是个异乡的外国女人、一个欧洲人。按照她的旅行护照，整个欧洲就是她的家乡。当我为生计奔走在城市时，我们邂逅，成了朋友。

我滞留在这里是为了工作吗？鬼话。其实，我在此无所事事。我不过是为开罗的一份日报写点稿子，可我写不写稿子对她无所谓，她在意的是我给不给她写信。

一天中午，在整天疲于奔命的人们的午餐间隙，我俩一起坐下来喝咖啡。她向我介绍自己，我也向她介绍我自己。我们从咖啡店的玻璃窗眺望远处蜿蜒的群山和鳄鱼尾巴似的河岸，彼此的沉默寡言使们的心更贴近了。

我爱上她之后，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人。我以话语为盾牌，使自己内心的真情不露声色。我空话连篇，没头没尾，却乐在其中，像是……爱得疯狂，我不能自己。

也许——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是无意识地用话语编织了一个网，把她网在其中。她睁大眼睛盯着我，微笑着问道：“你的话怎么那么多？我的职业就是说话，而你的话比我还多。”

但是，在那个中午，我太无能。话语的网子破碎了。结果是长时

间的沉默无语。我眼望着远处的河流，她低着头，用手在托盘里转动喝光了的咖啡杯。我眼前是她浓密的秀发和挺直的鼻梁。我无话可说时，她会突然抬头看着我：“还有呢，说吧……”而我却无言以对。

在咖啡店外，我们朝停车的角落走去。我将开车把她送到她的办公楼前，然后离开她，装着去上班。

我们走到车子跟前时，她说：“我想再走走，行吗？”

她在我身旁慢慢地走着，一反常态。没走几步她就站住了，语气坚定地说：“听我说，我不想再见到你。请你原谅我，但愿我们没有这次的邂逅。我想，我已经爱上了你。我真的不希望这样。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我真不希望是这样子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沉默了一会儿说：“随你的便。”随后我盯着她匆匆离我而去。

然而，这并不只是个开头。

开始时，事情并非如此。那时候，我常常参加记者招待会。我事先就知道，我无论写什么，开罗的报纸都不会发表的。即使能登出些东西，也会大加删改，变动段落次序，使读者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就想，今天埃及飞机又会载着某位官员到本市来，也许会是某位部长。我若讨好主编，主编会把它发表在头版位置。部长也会对我满意……部长宣布，“我国经济已经走出困境。我们将为更大更快的发展，研究同欧洲的合作……”汽车转上了机场路。主编对这突飞猛进的发展兴高采烈，每周都有追踪报道。多年以来，国家的突飞猛进不断地突破困境，主编又怎能不高兴呢？

我为什么在这个夏日美丽的早晨去参加这个倒霉的记者会呢？……难道我真的是交好运的人吗？是麦娜常常说的那种人？我为什么会去机场呢？……谁说某部长会来？谁说主编在等我的报道？我最好完全沉默不语。那时，我将谅解他那些烦人的道歉，“天啊！报道晚了。”或者说：“我们刊印了报道，主编在最后‘吃’掉了它！”或者说：“你知道吗？我在对外部调查了，根本没把报道转交给我。真的，我调查了……”如此，等等。我干吗去折腾主编还折磨我自己？反正每月的工薪不会不给，这是重要的。让我们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日子吧！

我把车开进了路边的高地，穿过一片丛林，面对机场。

我离开铺砌良好的大街，钻进了林间小道，呆在浓阴下。丛林湿润、寂静，新的叶芽刚刚开始覆盖树枝，一片葱茏翠色，似乎是透明

的。小树簇拥在土包之上，嫩芽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着。阳光从间隙中穿过。金黄色的光束在青草上游动，忽而消散，忽而显现，光束照亮了遍地的野花，有黄的、有白的，它们装点着夏日的大地。当我们第一次在周末旅行中去保加利亚时，我曾被大地的斑斓景色陶醉，像被麦娜陶醉一样。在丛林中，麦娜问我：“这些花不允许采摘吗？”我说：“不会吧。”于是，她摘了一束花，色彩多样。我端详着她手中的花束，听她失望地说：“这些花长在大地上是何等的美丽！”我发现她手中的花束果然已经没有了生气，枯萎了。花枝虽然还在黄色花朵的簇拥之中，但它显得瘦弱，已经蔫倒在她手的两边。我对她说：“我觉得野花只能生长在野地里。”我抓过枯萎的花束，把它抛向远处。只有一朵最大的黄花留在她的手中，伴着绿叶，我把它插进麦娜的秀发中。我说：“这下你就更美了。”真的，一朵黄花点缀在她乌黑的秀发中，她看起来的确很美、很美。我吻了她，我们都幸福地大笑起来。这是我们第一次避开人们的视线在丛林中散步。晚上，我们在旅馆里，我吻她就一定要付出代价了。在她脑子里的某个奇怪的角落里，她一直保持着一些鬼点子！当晚她半开玩笑地问我：“你过去是否曾经追着我来到欧洲？”我顺着她的口气说：“是呀，好多次了来执行秘密的使命。你为什么问这个？”她说：“阁下怎么能知道这些花只能生长在野地里？”我闭口不答。可是无济于事。她玩笑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她说：“你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同人们交往？”

“什么方式？”

“这种只对宾馆、食堂、商店工作人员和一般的人才用的方式。你是不是一个包工头？”

“麦娜，你是否知道我在埃及跟人们打交道的方式？”

她紧咬双唇，左右摇头，好像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会有新的判断。她说：“不知道，但是在此地，我知道……”

我想回答她，但我还是忍住了。我说：“也许你是对的。我要反省一下。”我很早以前就学会了平息她不明显的愠怒。我……够了！公平一点吧，她也一直在抚平我不明显的愠怒。问题不是那些野花，问题究竟在哪儿？难道事情一开始就错了？什么错？我记得，当初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是说，她一定在某个时候爱过我。否则，我们怎么会结婚呢？她来我们报社的时候，穷得很，是一个最穷最穷的姑娘，想跟她结婚的编辑排成串。

她常带着亮丽的微笑双眼盯着跟她说话的人的眼睛。她坦诚的话

话俘虏了大家，更俘虏了我。我总是费尽力气保持平常的说话方式，跟她说话，跟女编辑们说话，把眼光移到宽敞的编辑室别的地方。她却故意从她的办公桌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向我咨询某件事，像个老同事那样，研究她写的题材。或者，她在文稿交印之前，让我再读一遍她写的文章。接着，她便没话找话跟我讨论家庭问题的方方面面：她家的人坚持要她结婚，把她当做一件商品介绍给登门求婚的人。她决定一辈子也不以这种方式出嫁。她要自己找对象。为什么只有男人有自己择偶的权力？……她的话使我震惊。我心里想：假如她选择了我，可别对我这么坦率！但是，我克制着，继续与她交谈。

当我们手拉手地在滨河大道上漫步时，她大笑着对我说：“妈妈对我说，除了这个破落户，你就找不到别的记者了？为了他，连军官和博士都放弃了？”麦娜使劲掐了一下我的手，自豪地说出这番话。当时我着实吃惊了。“妈妈喜欢你，愿意有你这个女婿。”许久以前，我就知道她妈妈是个关键人物。我第一次见到他爸，我就喜欢他了。他朴实、友善。但是麦娜却有点不快，她觉得父亲在场让她蒙羞。我们当时还在求婚，坐在门厅里，她父亲却穿着睡衣或长袍就坐下了，十分自豪地赞扬他的老板，还说他下班时怎么买了一个西瓜。卖瓜的人说，这是个又脆又甜的好瓜，可是他回家后切开瓜一看，原来是个白瓤生瓜。于是，马上就把瓜拿回去还给那个骗子。因为爸爸是个维护自身权利的人，他不允许别人嘲弄他。麦娜听父亲说起自己的种种故事的时候，脸就会紧蹙着，臊得通红。我看出了她母亲眼中责备的眼神。我们结婚以后，她母亲竟当着我的面打他，使麦娜痛苦地流泪，因为她爸爸退休之后，已经习惯穿着大袍上街，同理发师傅、蔬菜店老板或者看门人闲聊，坐上几小时。她满眼泪珠斥责他爸，说：爸，你太不应该了，别这样了，听我们的吧！于是，她爸胆怯地表示愿意向她保证下不为例。爸爸去世时，麦娜痛不欲生。连续几个月，她一直两眼泪汪汪的，面对她爸爸的遗像说闲话，好像她爸仍然跟家里人在一起。她询问他的近况，问他为什么扔下她就走了，难道就一点儿也不想她了，不爱她了？我心里说：除了悲伤，这难道不是良心的自责吗？后来确实证实了我的怀疑。她开始谈论起她的父亲了。她父亲原来是办公室同仁很敬重的个性极强的一个人。他坚韧、坚持真理，他一生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对此深信不疑。有时候，她要求我学习她父亲坚韧不拔的精神。

当我被迫离职、无所事事时，她注意到我有一次理完发也在理发

馆呆了好长时间，和理发师唠叨个没完，漫无边际。当时我感到恐惧，立刻回家，坐在办公桌前，考虑我的写书计划。但是麦娜后来开始变了，变得很像她妈妈。她责备我宠爱两个孩子。可是，假如我真的要惩罚两个孩子之中的任何一个，她又会生我的气。她会站出来为孩子辩护。结果，惩罚往往针对她自己。我们周五出游归来，总会发现某个孩子出点什么错，或两个孩子一起犯了什么错，表现“不懂礼貌”，她便惩罚他们，不给零花钱，不许外出串门。假如我同哈里德下棋，她就数落我荒废了她的学业。假若我抱起哈纳蒂，把她放到我的肩上，她说我这种游戏造成她上周肚子痛。我发现哈里德爱好诗歌，我便鼓励他读诗。她却说没必要让孩子失望，他有数学天分，如此，等等……

还有呢！一次又一次，斥责我。使我警觉起来：她究竟想要干什么？她想控制两个孩子吗？随便吧！你自己呢？为什么不去做些什么，更多地接近两个孩子呢？你不是整天整天不在家，呆在报社或社会主义党部或出差在国外吗？你为什么为这点事责骂她呢？跟理发师有什么说的？……我一直在寻根问底，想寻找错误的根源，究竟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这些与我们的离婚问题是否有关联？

我从汽车的反光镜里突然看见自己心神恍惚的面容了，我吃了一惊。不！我不愿再是那个样子。在这美好的地方，在这充满阳光的早晨，我今天绝不再心神恍惚，不再为任何事情跟麦娜闹别扭。什么事都不想。无言无语地呆在丛林中过几个小时。假若办不到，那就走。我启动了汽车。

当我进入宾馆大厅，记者会尚未开始。人们在大厅里摆了两张桌子，拼成一个讲台，讲台后面摆了三把椅子。在大厅里摆了三十几把凳子。虽然只来了六七个记者，都一言不发地散坐在那儿。他们也许跟我一样，无事可做，所以就来了。谁让他们来的？谁在关注这一切？这样的会，由什么国际医生人权委员会主办，控诉智利侵犯人权，谁会重视？什么智利！什么人权！

什么都晚了，朋友！在恐怖笼罩之中，他们在首都体育场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阿连德已被军人杀了，挥泪的时间过去了。① 三年前

① 阿连德：原智利总统。1971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以身殉职。以皮诺切特为首的独裁政权建立。

他们杀了阿卜杜勒·纳赛尔，他们反对纳赛尔，说他是独裁者。<sup>①</sup>他们为什么要杀阿连德？他是民选上台的嘛！狼对羊羔说：假若你不是一个独裁者把水搅浑了，那么你就是个民主派也把手搅浑了。总而言之，你是我嘴里的肉，该吃掉你。现在谁还记得聂鲁达？<sup>②</sup>十年前，军人篡权后，他死于忧郁。他的名字我从未在我国的任何一份日报上见到过。他们使他销声匿迹，不让他为自己辩护，不让他作诗吟唱，不让他说：我的声音在全国的海岸线上飞扬，因为这是沉没者之声，每个不会唱歌的人，通过我的嘴唱歌了。我年轻时读过聂鲁达的诗。他的诗刊登在我国许多报刊上，甚至晚报都刊登他的诗。当时的报刊都说，任何一个国家人民的胜利，都意味着我们的自由。我们曾经为恩克鲁玛哭泣，为卢蒙巴哭泣。开罗电台曾经为塞得港欢呼，为阿尔及利亚欢呼，为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的人民欢呼。胜利的喜讯像鲜花一样盛开在屠场中心……是啊，不比屠场上的鲜花逊色！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读着下面的诗句，就泪流满面：鱼群都在海洋里喝着咖啡，孩子们却在饥饿之中。现在，已经没有人为这样的诗句哭泣了。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有钱人把咖啡倒入大海，或者他们吞食堆成山一样的蛋糕时，谁也不会哭泣了。人们理智了，暴风雨过去了。人们只会电视机前流下同情的泪水。其中，也包括你在内，伪善的人啊！你和国际医生委员会都一样……

我手中有一本小册子，它是摆在会议大厅入口桌子上的。我无意翻着小册子的内容，主席台上还是空无一人，开会的时间早已过了。我扫了一眼翻开的小册子。上面写着这样的内容：智利监狱中的行刑方式，正是该委员会以前散发的宣传品中曾经提到过的方式。它涉及智利、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洲的一些国家。在智利最流行的是电刑：把活动的电源线头接到罪犯的身体上。罪犯被捆绑在涂了腊的铁床上，电刑会给神经和肌肉带来剧痛。受电刑的结果会延续数年，它会造成人体肌肉的抽搐，使人长期失眠、做噩梦，使人陷入幻境而且始终摆脱不了第一次受刑的感觉和苦痛……还有名叫针刺的电刑……

听到大厅里有了动静，我就停止阅读小册子。我看见一个高个

<sup>①</sup> 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年）：埃及“7·23”革命的领导人，后任埃及总统。

<sup>②</sup>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年）：智利著名诗人，政治外交家，1971年获诺贝尔奖。著作有《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船长的诗》、《西班牙在我心中》等诗集。

子、斑白头发的人坐上了主席台。他沉着地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大厅，毫不感到惊奇，然后开始用英语讲话。从他讲话的语调，我猜到他是一个德国人或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他说：他名叫穆勒尔，是个大夫，对会议的延误表示歉意。他说将会说明会议延误的原因。他说他这个委员会包括来自各个重视人权状况的国家的大夫，都是志愿者。委员会特别关注医疗卫生方面的情况。委员会发现智利政治犯的情况很严重。这些犯人的数量有数千之多。接着他念了一些数字，说明监狱中病号有多少，刑罚有打骂、电刑、禁止睡眠、奸污等，还念了已经被折磨致死的犯人的名单……

我们大家开始发问，要求了解一些细节和更多的数字。突然，我认识的一位本地记者站了起来，他是《祖国报》的。《祖国报》曾连续攻击来自智利和其他国家的移民，要求遣返或驱逐他们。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过许多文章，说这些移民造成国家人口的拥挤、犯罪增加、环境污染，应该解救国家不受外来移民的危害。记者挑衅地问穆勒尔博士道：“尽管你说了那么多智利的情况，你不认为智利还是比许多别的国家安定吗？你不认为智利监狱中死亡的人数仍然比邻国死于内战的人数少得多吗？”

大厅里响起一阵声讨的嘀咕声。坐在我前排的一位女记者大声问道：“这次会议是否邀请了智利的将军们出席？”她的话招来别人的一些评论。穆勒尔博士用手指敲了两下桌子，平静地对《祖国报》的记者说：“先生，我不是政治家，我们的组织也不是政治机构。我们是大夫，只介绍一些我们调查的情况。不过我可以提醒你一下，智利政变前没有死什么人，既没有人在游击战中死去，也没有人在监狱中死去。所以，如果你愿意，应该对此进行一番比较。”

穆勒尔博士看看手表说：“对不起，我们租赁大厅的时间已到，已经一个小时了。我们还迟到了，因为我们准备给各位提供的证明材料的西班牙文稿出了些问题。”他指了一下前排，曾坐在他身边的一男一女站了起来。他接着说：“本来应该来一位专职译员，可是，他在最后一刻抱歉地拒绝了。。另一位朋友伯蕾吉蒂·希弗尔女士提供了译稿，我感谢她。”

伯蕾吉蒂身穿一套蓝色制服，像空姐一样，脖子上围了一条玫瑰色的围巾，坐在博士和另外一位男士之间。她面露微笑，不太自然地对我们说：“我翻译得很慢，请大家原谅。这是我第一次做译员工作。”全场记者的眼睛都盯着她，她十分亮丽。有一个记者说：“我们

会很高兴地原谅你，请你抓紧时间。”人们大笑起来。穆勒尔博士又敲了敲桌子，严肃而又近乎责备地说：“我刚才对大家说了，这份证明材料对我们组织来说十分重要，它涉及医务人员。我希望大家仔细听听。”接着他示意那个男人开始说话。

这时，我把目光从伯蕾吉蒂身上转到那个男人身上。他坐在她的右边。我看不清他的脸。他低着头，几乎把头埋在胸前的两臂之间，甚至连他的一头黑发也看不清楚。他说话声音低沉，伯蕾吉蒂好像在提醒他大点声说话，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他仍然没有抬头，伯蕾吉蒂开始翻译。他每停一下，她就翻译几句。她用记者们通用的英语进行翻译。

他说，他名叫彼德罗·伊巴尼兹，36岁，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出租车司机。年初的一天，他的车停在车站前的出租车停车场里，等着拉活。他看见有个人走出车站，手里提着一个包，朝停车场走来。靠近他的车时，另一个司机迎了上去。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这人指了指他的车，想接过他的包，但是遭到拒绝。他不给他包，也不愿跟他走，反而朝着我的车走了过来，我的车离他最近。根据乘客的指点，我开动了出租车，同时发现另一辆出租车也尾随在后。他认出了司机，正是那个想接包的人，他的旁边还有别的一些人，乘客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不断地往后看，显得局促不安，但是他仍极力控制自己的恐惧。彼德罗害怕了。乘客对他说：快点！快点！说话时眼睛时而盯着后面的车，时而看看前方。突然他对彼德罗说：听我说，他们要抓我。他们是安全局的人。彼德罗想停车让乘客下车，但又担心乘客遭遇不测，所以当乘客要他离开大道钻进岔道时，他听从了。彼德罗说，后来他后悔了，那是个坏主意。其实追车的人在拥挤的大道上，什么也干不了。可到了岔道上他们很容易地就盯上了他的车。彼德罗竭力想摆脱他们，可是他们的车新，速度快。乘客看出了这一点，不再往后看。他缩坐在座位里，沉着地对彼德罗说：听我说，我很遗憾，让你卷入我的事中。彼德罗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事。但是，当后来的车在一个交叉路口赶上来的时候，乘客突然打开车门，跳了下去。他开始朝大街上狂奔，但是刚跑了几步枪就响了。他赶忙趴在座位上。他感到子弹已经击中了那个人，他摔倒在路上，头上喷出了鲜血。

彼德罗平静地叙述着，伯蕾吉蒂平静地把他的话译成英文。她双眼环视着大厅。我发现她的脸色铁青、声音逐渐高扬。彼德罗用手示意子弹射人体内的部位。穆勒尔博士以食指指指手表，暗示他们快些

说。彼德罗歉意地点点头。他早已忘却了羞涩，抬头扫视了大家一眼，大大的双眼和双眼下宽宽的黑色眼袋，像倒置的双眉。这是失眠，我自言自语地说。

彼德罗的语气经博士催促之后有所改变。他的话断断续续地脱口而出。伯蕾吉蒂跟不上他的速度了，她向大家表示歉意，有时还请彼德罗重复一遍。事情不那么连贯了，这一次他用手指指胸口说，子弹是从这里进去的。我当然不知道那乘客是谁，有些遗憾。我的意思是说，子弹从腰间射入，留在胸腔里。医院的人是这么说的。在这个地方……但是，乘客在坐上出租车之前，我并没有见过他……我以为他已经死了，不，我肯定他已经死了，我亲眼见到了血，看到他的脑浆溅在了人行道上，然后才断了气……军官在医院里讯问我时，我口干舌燥，摇了摇手说，我不认识他。军官拔下了给我输血的针头，拔掉了给我输氧的管子，说：我会让你死！你是卡比底罗的朋友。那么多出租车司机，他为什么独独选了你？当时，大夫就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目睹了一切。军官是安全局的……氧气管被拔掉后，我开始不行了，呼吸越来越困难。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卡比底罗的名字，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我兄弟也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当我想把这些情况告诉那位军官时，我满嘴都是血，之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第二天我苏醒过来后，他们又开始审问我。那天有三个安全局的人，他们问我的家庭情况：你家里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吗？是不是阿连德的党徒？……我生于农村，但即便在当时农村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要过地，我没要，我兄弟也没要……所以政变之后，地主返回农村，也没有我们的事。农民们把土地还给了地主。我是说，我们没有跟那些拿了地主土地的农民一起被关进监狱。可是我不能说啊！我不能回答他们的问话，我实在劳累之极。于是，一个军官伸手关掉了氧气管。我立刻感到鲜血涌到了喉头，涌到了嘴里，听得见血在喉头咕嘟咕嘟响，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大夫过来，用器械从我嘴里把血抽出来，装满了好几个瓶子。大夫劝我说话以挽救我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并没有打开氧气管。他对军官说，我不能说话。彼德罗两手前伸，圆睁双眼，大声对我们说：“没有氧气，人能说话吗？”

《祖国报》记者大笑。大家都生气地朝他望去。还有个人对他说：“嘘。”可是，他却视而不见，谁也不搭理。彼德罗以为他说错了，有些紧张，接着又低着头说起来了……

我想这事发生在第三天，不在第四天。他们把我弟弟弄来了，他

们说已经发现我弟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说了谎。我说过我弟弟在大学读书，是吗？他们吼道：你必须把有关卡比底罗的事都交代出来……可是，我不认识卡比底罗这个人，我又能说些什么呢？那天我还不能活动。我躺在床上，看着他们扒掉我弟弟的衣服，把一块大毛巾塞进他的嘴里，把他的双脚、双手捆在我身边的铁床上……我只能转动我的双眼，我呼喊我弟弟不认识卡比底罗，我也不认识卡比底罗……我喊叫，却喊不出声。我看着他们把电刑刑具放在我弟弟的身上。医生把听筒放在他的胸口上，对军官摇了摇头，就走了。可是，他们对他动刑的时候，大夫一直站在那里……我听到我弟弟在呜咽，看到他赤裸裸的身体绷紧起来，有时弯下去，连床都被带动了。当时，假若我能说话，我会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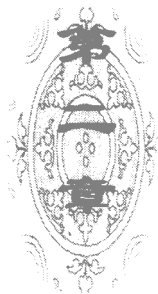
在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却不知道彼德罗·伊巴尼兹当时说了些什么。突然，伯蕾吉蒂·希弗尔上气不接下气地停止了翻译……她突然举目望着大家，圆睁双眼，绷紧了脸，双唇抖动。彼德罗低着头在说话，继续说着生硬的西班牙语，我分辨不出他说的话……安全局……卡比底罗……医生……伯蕾吉蒂紧咬嘴唇，凝视着大家。后来，她双唇松动了一下，然后又咬紧了。她没有哭，一声不吭。她只用蓝色的大大的双眼望着大家。彼德罗终于发觉大厅里一片沉静，便抬起了茫然的双眼……

穆勒尔双眼盯着她走出大厅后，才转向我们说：“对不起，会议的时间到了。总之，我能说的是，我们委员会调查了整个事件，各种细节都已经肯定。几个星期之后，彼德罗逃离了军队医院。他的朋友帮他逃出智利，在加拿大得到治疗。子弹和酷刑伤害了他的胸部。这是你们在传单中已经读到的。总之，谢谢大家的合作，希望你们能把这些材料发表出来……”我坐位前的女记者站起身来，为彼德罗照了张像。他当时正茫然地看着我们和大夫。女记者坐下来高声说：“这种职业真该死！”

大厅远处的记者伯尔纳站起来，他答道：“什么职业？新闻，还是安全局？医学，还是电学？开出租车，还是……？”

他踢开铁椅子后说：“还是这世道？”

椅子滚动的声音持续了几秒钟。后来，一切便恢复了平静。



## 遥远的过去死了

我站在大厅入口处，翻阅尚未看完的宣传品。其中有份传单的封面上，印有彼德罗·伊巴尼兹的头像。旁边还有一个小伙子的照片，我猜那就是他的弟弟。他长得很像彼德罗，宽嘴、浓发，一双黑眼睛上面是浓浓的眉毛。他穿一件白衬衫，领口开着，紧绷着嘴巴，面色严峻。他似乎是想显得成熟些。我看着记者们纷纷走出大厅，行色匆匆，看也不看那些宣传品，好像是要逃离那个地方，回避那些事变。我了解这一点。午饭前，人们将会把彼德罗、他弟弟和智利一古脑儿忘得一干二净，为他们的报刊发回别的新闻电报和报道。这时有一只手在我的肩头拍了拍，我听到一个声音说：“我一直在寻找你呢。”

我回头一看，惊呼一声：“伊卜拉欣！”

是他！伊卜拉欣·艾勒·麦哈拉维。这么多年了，人变瘦了，头发也白了，但仍然富态十足，胖胖的，跟年轻时一样。我握住他的手，尽力露出一丝微笑。他却突然用左手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使劲拥抱我，让我受宠若惊。

伊卜拉欣感到了我的僵态，退后一步说：“自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有很多年了吧？”

他注意到了我不安的神色，微笑着说：“我知道你还保存着很多诗，还记得诗圣的名句吗：死亡抹去了我们之间的怨愁！”

朋友，许多事已经逝去，怨愁还有什么意思。

我羞涩地说：“是啊，是啊。你还在贝鲁特工作吗？”

“是的，我现在是进行一次工作采访。昨天刚刚到此地。真抱歉，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你也在场。要不，我会……”伊卜拉欣翻了翻那些

传单、宣传品，放进小包里一些。他说：“相信我吧！我未曾看见你，压根就没想到你也在此地。我想你们的报纸对智利不会感兴趣？”

这时我才发现，印有彼德罗照片的传单还握在我手中。于是，我送回传单，说：“哪家报纸会感兴趣呢？任何一家报纸，哪怕只发表一条短短的五行字的消息，彼德罗·伊巴尼兹就会交好运了。至于我那报纸，你是清楚的，世界顶尖新闻也不会超过五行字。我们也变了。”

伊卜拉欣压抑着笑声，同我一起离开了大厅。他说：“是呀，报纸真有了变化。我对此不会不表示震惊的。我呆在巴格达时，就捡到过一份。头版位置的四方块里的标题是：海关税款和薪水。我凝视着这个标题好一阵子，我想，会不会出了印刷错误。后来才明白，这条消息说的是大小雇员提升的事。真主无所不知。你会想象到我们那么革命的报纸会这么变态吗？”

我摆了摆手说：“别说了，求你啦。去喝杯咖啡吧，有时间吗？”

“喝什么？我们去吃一顿午饭吧，不反对吧？”

他的热情使我惊诧不已。在路上，我竭力抑制着内心的不快，跟他议论一些老熟人的情况，免得谈话干瘪。实际上，我见到他很高兴，我们过去不算什么好朋友，年轻时只在国外报纸的消息版面上共事。他是个马克思主义派，热情、奔放。他常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认为他教条、僵化，脱离群众。那时候，我喜欢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写的东西。我坚信，我们国家有阿卜杜勒·纳赛尔就会强大起来。我在编辑部里，把他在埃及—叙利亚实行联合之日发表的著名演说挂在口头上：“一个大国，保护自己，不威胁他人，捍卫自己，不一盘散沙。”这条横幅，是报社的书法家用库法体书写的，很好看。我把它挂在阿拉伯祖国的地图下面。伊卜拉欣看见这个横幅时，一脸微笑，装得面容严肃、持重。我激动了，跟他争论。可是，当他 1959 年被当做共产党分子抓起来的时候，我真为他伤心。我失去了他。出狱后，他回到报社，我们和好了，像两个老同事、老朋友一样。我们的关系一直维持到他出国。20 世纪 70 年代，我遭遇不测，被提升为谁也不理不睬的编辑部顾问。他到了伊拉克，后转到叙利亚，最后在贝鲁特定居下来，在一份抵抗运动组织办的报社供职。

我们现在不期而遇，一起在外国的城市街道上漫步。我们多少有点尴尬，我们双双竭力像好朋友那样交谈。我们毕竟分手多年了。然而，沉默的间隙，的确使人局促不安。我们并不真想追忆过去。于

是，我就说这个城市的一些景点。他毕竟是初次来到此地参观。我们从宾馆走到海边，穿过一个广场。广场周围是一些新的罗马式建筑，有高耸的圆柱。广场中央是一个秃顶男子的雕像，骑着大马，手指前方，十分庄严。我告诉他这是博物馆，那是大学办公楼。那位骑士在19世纪领导了一场解放战争，把法国人赶了出去。我说得很详细，有说不完的话。伊卜拉欣不断点头称是：是啊，真好！可是后来，无话可说了，我们便沉默无语地闷头漫步。

最后，我对伊卜拉欣说：“真对不起，我让你跟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这是一家咖啡店，我常常在此停车。”伊卜拉欣在咖啡店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你是对的，我当初就后悔，离开故土不再返回。”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说这话是为了迎合我，还是这地方确实让他喜欢。我是喜欢这个咖啡店的。它外形呈椭圆，深入河面，极像被抛弃在崖石上的贝壳。它占据了河岸边一处宁静之地。有一条小路，通向咖啡店前，鲜花装点着道路两边蜿蜒的水渠。

咖啡店内顾客不多，在靠窗的地方，我们坐下了。从窗外宽阔的河面，可以看到绿色葱茏的小山和宽大的花园。树林间是些白色的房舍，屋顶似阶梯式金字塔一律铺着红瓦。这些房屋一直建到山顶，呈三角形，点缀在树林之中。我们落座后，伊卜拉欣低声说：“这地方真宁静、平和啊！”

我猜想这时候的他可能是想起贝鲁特。不过，我不说。我让他凝视眼前的河。河水清澈，匆匆流去，激起前涌后赴的银色浪花，闪闪发光。几只白色的天鹅在水面盘旋，高高地昂着头，静静地注视着窗口。几只褐色的野鸭伸着紫色的脖颈，冲着我们游过来。游到窗下后，便摇动着嘴，发出断断续续的鸣叫。坐在我们附近的一位女士，便朝它们扔去一些面包屑。

伊卜拉欣看看山，又看看河，思绪万千地说：“你生活在这个地方，太幸运了。”

“是的，我很幸运。”

伊卜拉欣觉察我的话中有话，歉意地说：“我的意思是……”

他没有说下去。这时，服务员走过来了，问伊卜拉欣是否想喝点啤酒，他说：

“中午不喝，我只喝咖啡。”

我们要了咖啡，我笑着说：“我从来没听你说过中午或下午不喝啤酒的话啊！”

他简短地答道：“年龄不饶人吧。”

接着他用手指着我的黑发说：“说到年龄，那你的头发怎么还那么黑？我们都成白头翁了，而你还是一头乌发呢。”

我指指我的头，轻声笑道：“我的发育停止了。”

伊卜拉欣笑着答道：“要能中止发育，阻止产生白发，我就不会成白头翁了。我和我们那边的人，从大西洋到阿拉伯湾统统变成快乐的小孩子了，我们的发育都终止了。”

我手指着他提醒说：“你这样的乐天派可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啊。”

他点头示意，又转眼看着河面：“是啊，在这个地方不应该说这种话。我们忘掉它吧！你孩子好吗？”

“哈里德和哈纳蒂吗？哈里德已是工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了。他很快会路过我们这儿，代表埃及参加伦敦青年国际象棋比赛。哈纳蒂在读初中，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到她了。我常常写信给他们，也常通电话。”

伊卜拉欣有点发窘地说：“是啊，我已经听说了你和麦娜的事，所以我一直没提这事，免得勾起你不愉快的回忆。当初听说你们离婚，我确实为你们难过。你们虽然意见不合，但我敬重你们。她维护女权的勇气令我折服。”

我伸开双手热烈地回答他：“我也一样，我佩服她。我觉得她主编的妇女版块是我们报纸改版后惟一可读性较强的版面。”

伊卜拉欣颇不解地问道：“那是为什么呢？你跟她有些分歧，我还替她说话呢。我责备你应该负责，一点点小事就吵嘴。我常数落你，你当时极力反对她在报社工作。”

“是的，我觉得孩子们有权利在家跟她多呆些时间。”

他摇头表示不赞同。他说：“她为什么不能坚持孩子们有权在家跟你多呆些时间呢？你过去大部分时间不在家，不是在报社，就是在社盟总部或出差国内、国外，为报社的事奔忙。她为什么没有这么做的权利呢？”

我心里叹道：是啊，我们又争上了！社盟和报社！还是谈谈你吧！别净说我的事，跟我秋后算账，行吗？但是我只机械地回答他：“也许你是对的。我坚持母爱高于一切，比父爱重要得多。或者，我错了。但是，这不是我们分手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